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

总主编 ◎ 达力扎布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ZHONGGUO JINDAI BIANJIANG MINZUWENTI YANJIU

陈 理 彭武麟 白拉都格其 ◎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PRESS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ZHONGGUO JINDAI BIANJIANG MINZUWENTI YANJIU

陈 理 彭武麟 白拉都格其
主 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PRESS OF THE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陈理等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9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81108 - 581 - 5

I. 史… II. 陈… III. 边疆地区—民族问题—
中国—近代—文集 IV. D693.7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2611 号

中国近代边疆民族问题研究

主 编 陈 理 彭武麟 白拉都格其
责任编辑 雨 山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29.5
字 数 395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581 - 5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前言

中国民族史及中国边疆地理研究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撤销了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的历史系、社会学系，三校的民族史、民族学、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汇集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建立了民族研究部。1956年，又创建历史系，著名蒙古史和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担任系主任，分设民族历史和民族学两个专业方向，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吴文藻、潘光旦、林耀华、费孝通、傅乐焕、王锺翰等著名学者在系任教。20世纪50年代，全体师生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并参加《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的编写。尔后部分教师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委托，整理了中印、中苏、中越边界资料（包括南海诸岛资料），并负责《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部分的编绘工作。历史系和民族研究部的相关人员构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研究方面的重要力量，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民族史和边疆史地论著。近年中央民族大学王锺翰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费孝通、陈连开等先生编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先生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卷》，谭其骧主编、张锡彤等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的边疆史地研究学科被列入国家教育部“985工程”重点建设的学科，建立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作为该学科的创新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以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为核心，汇聚国内外一流人才，开展合作研究，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本中心的宗旨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坚持百家争鸣，鼓励学术创新。注重选题的前沿性，在充分利用汉文史料的

基础上，鼓励发掘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史料和域外史料，注重田野调查，在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取得原创性成果。推出新人新作，培养中青年学者，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队伍。

《中国边疆民族历史与地理研究系列丛书》收入的论著都是本中心二期建设期间的科研成果，将其奉献给国内外学术界和读者，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并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衷心欢迎国内外学者与我们建立学术联系，积极参与和支持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项目，共同为该学科的发展，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在本系列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向关心支持本项目的国家民委和学校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领导，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领导，以及所有支持和参与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达力扎布

2007年10月16日

(018) 林 未 越南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林未

Contents 目录

(272) 韩 冰 试析高宗皇帝对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

目录

(432) 韩 冰 试析高宗皇帝对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

近代民族政治理论

- “大一统”观念中的政治与文化逻辑 陈 理(3)
- 中国近代国家转型中的民族政治 关 凯(14)
- 近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文化考察 张晨怡(48)

近代民族自治与“独立”

- 勒旺诺尔布对 1911 年外蒙古“独立”的态度
..... 苏日塔拉图(67)
-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内蒙古自治运动述评 赛 航(81)
- 民族区域自治的早期实践——中国共产党在
湘鄂川黔边区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 罗维庆(97)
- 《新亚细亚》月刊内外蒙古研究述评 叶罗娜(114)

近代新疆民族政治问题

- 新疆建省与清廷治新政策的转型 蓝书燕(147)
- 试析金树仁政权倒台之原因 赵 睿(180)
- 关于“哈密事变”相关问题探析 赵逸妍(209)
- 试评张治中的治新思想与实践 彭武麟(243)

近代康藏政治与中央关系

- 试析 1930—1940 年中央与西藏地方之关系
——以第三次康藏纠纷为例 杜丽娟(281)

- 黄慕松入藏与南京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调整 朱 姝(310)
- 西康建省与康人“省籍意识”的出现 辛宇玲(339)

近代西南民族关系

- 咸同年间云贵地区民族关系简析 刘 静(375)

近代边疆民族移民

- 晚清东边道地区朝鲜族迁入研究 周靖程(435)

余型台類燕另升改

- (7) 熊 翥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 (41) 疏 关 帝題燕另節中聖詩樂國升改國中
- (84) 翁 翼 翥 察善詩文兩類張念厥“燕另半中”升改

“立縣”已台自燕另升改

更态節“立縣”古蒙代平 1191 扶許冰街刊傳

- (76) 國 志 卷 日 志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 (18) 疏 奏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 (79) 疏 奏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 (111) 疏 奏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應向余類燕另臺豫升改

- (741) 燕 井 益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 (381) 春 涉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 (303) 補 數 法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 (343) 補 數 法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系关央中已台類燕另升改

系关之式與蒙西已央中平 0401—0291 補改

- (182) 疏 奏 輯聖詩文已台類節中念厥“龍一大”

近代民族政治理论

“大一统”观念中的政治与文化逻辑

陈理

中国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入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动地”开始构建近代民族国家和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压力之下，源自欧洲的民族—国家发展模式在19世纪末成为中国人效仿的榜样。从那时起，在中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曲折而艰险的历程之中，如何在相互冲突的中西政治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做出选择，始终成为中国思想界久治不愈的顽疾，而这一点，直到今天，似乎仍然缺乏共识。

近年来，学界一直有一种声音，主张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资源以修补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文化的隔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近代欧式的民族—国家观念和中华文明的“天下观”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不可调和”的观念冲突？

中国与西方认识民族实体有一个根本性差别，就是我们更多地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民族差异性，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相配合的政治学说体系来看待这个问题。当然，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民族观念的形成都跟政治有关。但如果只从政治角度理解民族，很多问题就无法解释。在这一点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理念，对认识中国的民族问题非常重要。

一、“大一统”理念的形成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产中，如何看待民族实体似乎充满了矛盾。比如一方面有“有教无类”“华夷一体”，另一方面又有“华夷之辨”。这是一对矛盾。要注意的是“华”和“夷”都是文化概念，

如果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时，“华”、“夷”就不是严格区分的了。一个王朝如果过分强调“华夷”的政治差别，对其“大一统”的巩固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无论是哪个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华夷”在启动时都是以政治话语、文化认同发动的。一旦取得中央政权之后，淡化“华夷之辨”就是其必然的选择。最典型的莫过于清朝雍正皇帝亲自撰写的《大义觉迷录》。

春秋时期，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大一统”的文化概念。战国时，孟子就有了“天下定于一”的预见。《春秋公羊传》将“春秋”所纪242年历史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所谓《公羊》三世说，第一阶段“据乱世”，主要特征是“内其国外诸夏”；第二阶段“升平世”，就是“内诸夏外夷狄”；第三阶段“太平世”，则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这是从古代民族关系的角度对“大一统”的阐释。周天子分封诸国，有一个维系着诸国的核心体制，这种核心体制更多的是因族别、“国”别而存在，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东西。故而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周天子为核心的“一统”观念经历了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之后，中国初步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而在汉代，在政治格局之上，又发展出来一套比较完整的并相当精巧地服务于政治统治的既有“华夷之辨”又有“大一统”观的儒家思想体系。

显然，在疆域上秦朝就已经形成了政治上“大一统”的格局。但客观地说，我们过去是过分夸大了秦朝统一对当时历史进程的推进作用，其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朝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各领域的统一。至于“书同文”是指将作为文化载体的方块字统一用一种字体书写，而非统一不同层面上的民族文字。这肯定是一大进步，但是仅仅是技术—文化层面的东西，政治上的一统格局必须要有意识形态来支撑。秦朝焚书坑儒的举措就是立足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统，企图以法家思想维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统治。但是当时并未成功，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实现了思想上的一统。

尽管“大一统”被后人视为儒家的经典概念，但其实和孔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秦统一到汉武帝统治前的几十年间，董仲舒所

主张的那种儒法学说并没有为统治者所重视。汉初最终选择黄老之说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而是涉及到国体问题。汉朝是个很集权的王朝，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秦朝的郡县制。同时汉朝也有封国，那是汉朝朝着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发展所不得不走的弯路。经过“文景之治”以后，应该说国家的经济力量已经能够支撑中央通过军事力量巩固自身的政治权力。除了军事力量以外，汉朝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我们看到的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现象只是汉朝思想统治为政治统治服务的一个方面，其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皇权的正统性。法家的实力政治论不能提供这一点。这个任务是由儒学“天人合一”的学说来完成的。在汉朝，道家的五行学说也比较流行，于是汉朝统治者将道家的五行学说与改造后的儒家学说构建为一个完整的、一直延续到清朝的政治思想体系。

二、“大一统”理念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

“大一统”并不单纯是一种观念或学说，实际上，它同时是一套与这种观念或学说相对应的政治制度。中国古代的社会建构、社会秩序都是依靠这套制度实现的。这套制度构建的原则、理念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辅以法家学说，而与之配合的，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一整套不断完善和精细化的社会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在于建立高度集中的君权，以君权为核心建构一套价值的、伦理的和社会生活的秩序，实际上家庭只是为之服务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大一统”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最深厚的那部分内涵，反映出中国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严格说来，中国没有单纯的政治学，也没有单纯的伦理学，而是将伦理学与政治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比如“三纲五常”中最核心的东西是“家”，而不是“国”。“家”中有一个“真命天子”，即父亲；“国”中也有一个“真命天子”，即国君。在家要尽孝，对国要尽忠，这是政治伦理学的反映。

实际上，“家”和“国”都只是“大一统”之下的不同领域，它们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大一统”的理解，实际上包含这样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大一统”的政治体系，在中国是最强大的，而且越来越

强大，但是它的族别色彩很弱。一定意义上具有超民族性。

第二，“大一统”需要一个支撑它的思想体系，最初构建这一体系的就是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

第三，中国文化的族别性差异很大，又形成了一个以华夏，即汉族人口占大多数的文化，这就必然形成一种尊重差异文化的体制。正是这样的文化体制，加上统一的思想制度，使得中央王朝在治理、调整各种关系维护“大一统”的时候，具有了灵活性。如果只有统一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制的话，在调整关系时，就会缺乏弹性、可伸缩性，最终也会损害到一统的政治思想体制。《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因而应“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承认文化上的差别性，这正是中国人高明的地方。在政治上，必须是统一的、一元的，而统治形式可以是多样的；在思想领域也必须如此，但不是暴力的，而是通过和平的“教化”实现一统；在社会生活领域，多样性和差异性就表现得特别充分。从汉朝到清朝，由于继承了文化多样性的传统，中央王朝对待百姓的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因循其俗，也就是说国家并没有过深地介入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的社会生活。

历史上中央王朝对社会生活的管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它的基本要求是百姓或地方性政权需要缴纳地丁钱粮，“称臣纳贡”就等于纳入了帝国的有效管理范围之内。纳粮、服役就是百姓国家认同的方式。但是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由于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当地的百姓就不需要向中央缴纳地丁钱粮，这是因地制宜的措施。此外，还有一些羁縻地区，那就更显宽松。

“羁縻政策”是中国独特的治理边疆的历史经验。“羁縻”是一种非常形象的说法，“羁”是马的笼头；“縻”是系牛的绳子，其含义“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羁縻政策”之下，少数民族地方首领除在政治上隶属中央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现在有一些学者解释这种政策的本质是当时的中央朝廷由于力量不足以全面控制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而不得不为之的一种妥协政策，实际上不能这样简单的理解。

当一个中央政权建立之后，必然会一步步加强其中央集权。问题是天下越做越大，必然会遇到一些差异性。一个地区必须首先服从中央的政治利益，地区的差异性只要没有威胁到政权的核心利益，就可以从其俗；如果威胁到核心利益，就会引起重视。比如在西南地区，明清时期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就是因为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威胁到了中央的利益。

在少数民族建立的元、清这两个朝代，表面上看，似乎是“以夷治夏”，实质上都仍然是“大一统”的延续。观察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某个民族进入中原建立王朝，就是“以夷治夏”。这恰恰是与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体制、文化思想体制不相符的。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这个政权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使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进行统治，以怎样的文化内容涵化社会。不能以民族简单而论。

中国各个王朝在取得政权后，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文化的差异性，求得大传统层面上的同一文化认同，从而获得政治上的认同，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旦达到目的，作为一个继承传统的政权，作为最高统治者，就不能更多地讲华夷。蒙古族长期从事畜牧业，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在历代王朝中是最强化“华夷”的差异性的，这就很难获得被统治民族对元朝的政治认同，这应该是元朝统治不足100年就灭亡的主要原因。

三、“大一统”理念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大一统”的理念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而这两千年中中国封建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一种“超稳定结构”。这种结构之所以能够“超稳定”，很难说是由什么单一因素决定的，它不仅与环境因素（如治水决定的国家必须保持大规模社会动员的能力）有关，也和生产方式、价值观念这些文化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农牧两大生计板块的地理、漫长的历史传统、厚重的文人积淀都起到了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实际上证明了“大一统”最有利于中央王朝建立和维系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大一统”在调适各

阶级、各阶层、各民族之间具有自身的价值。建立一个过分单一的模式，就可能出现不断冲突的状况，各民族各阶层皆受其害。“大一统”体系不主张使用这种方式，它承认文化多样性、民族多样性。这些多样性只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就会得到承认。中国人口的每次膨胀都是在“大一统”时期，因为“大一统”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还有它可以降低国家的交易和管理成本，何况还有治水之类的解决自然与人的矛盾方面的需求。

“大一统”的理念和制度中所包含的对“一统”的追求，必然创造出一种“有教无类”的文化认同。“有教无类”原本是孔子在学识方面的教育理念，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治国方略，应该归属到思想统治、意识形态统治的范畴。如果把“教”与“类”分出层次，也可以说它是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的有效方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首先是承认多样性，这是维持统治的一个前提。但是如不加限制，又会在客观上对统一的结构构成挑战，因为多样性与一元性领导毕竟是有矛盾的，就需要通过大传统的文化来教化、培育一些普遍认同的价值。这就必然需要采取文化上的引导，即所谓的“有教无类”，通过一个与统一的、集权的中央体制相吻合的思想进行教化。通过教化减弱文化差异性，主要是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领域，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体制的认同。儒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

“大一统”提供了一整套不同文化群体在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文化适应与融合的机制。帝国都有一个扩张的过程，扩展时期一般都是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其实各地各民族对中央王朝所代表的文化大传统的认同也是经过几次大的征服才形成的。这说明扩张与“大一统”理念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持的文化互动关系。一般来说，中国历朝历代都在扩张时期更强调“文化主义”的主张，也就是说中国的历朝统治者不是强调有形的领土的直接占领，而是文化征服。如果匈奴不南下侵扰，汉武帝就可能不会与匈奴开战。当汉朝蓄积了一定的力量战胜匈奴时，匈奴的臣服也就意味着汉朝领土的扩张。国土观念是在近代产生的，是民族国家形成以后的产物。对古代王朝而言，统治者在乎的是自己管辖范围之内的统一，对臣服领土的

管理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延伸。同时，在周边还存在不同族别形成的国家或者政权，这就有一个认同的问题，但这种认同的边界是只要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就可以了。

四、“大一统”与传统官僚体系

“大一统”这套制度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制度循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各个王朝都有一个英明的开国君主和以他为中心的一批精明强干的开国将相，同时也都有一个昏庸的末代皇帝和他身边一群祸国殃民的“佞臣集团”。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成因，就是封建专制体制必然形成的封建官僚制度。官僚体制既是维持统一的工具，又往往是制造动乱的推进器。实际上，真正能毁灭“大一统”统治秩序的根本力量，往往并不是来自于极端困苦条件下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而是来自官僚体制本身。

不难发现，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过程中，存在一个“统一—分裂—再统一”的“王朝怪圈”或者“周期律”。

在这个怪圈中，始终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会渐渐削弱“大一统”。一方面，中央集权、“大一统”需要一个官僚体系来维系，以维护统一的社会局面。国家形式有其超阶级、超阶层、超民族的一面，当官僚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时，就表现为对百姓轻徭薄赋。但是官僚集团是一个由庞大的人员组成的特殊群体，有其特殊的集团利益。有形的官僚体制形成的官僚集团和国家追求的利益不一致时，官僚集团通过政治资源获取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这是对分配制度的破坏，是对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破坏。当从中央集权衍生出来的官僚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它要最大化的攫取社会资源、社会财富，为此必然对百姓进行盘剥。盘剥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民众各种形式的反抗，包括民族形式的反抗，从而打破“大一统”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由地主、佃农和自耕农组成的。在古代中国社会，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其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自耕农数量是上升的，当自耕农经济发展比较好、自耕农阶层比较庞大的时候，恰恰就是封建社会的盛世。但是自耕农经济是一种小农经济，非常脆弱，来自于经济盘剥、政治权力的盘剥，非常容易导

致自耕农经济的衰败，表现为自耕农失去土地等生产资料，出现自耕农减少、社会衰败的现象。与之并行的另一条曲线是流民增多。这种现象通常在一个王朝统治的中期出现，并引发社会动乱，社会生产因此中断，财富积累亦随之中断。虽然其间可能会出现新政进行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因此，一旦封建官僚体制衍生出来的官僚集团的利益大于国家利益时，就会导致国家的衰亡。“秦一统”

五、“大一统”与“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费孝通先生 1988 年就中国社会的民族结构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先生所言的这个“一体”，其中既有政治含义，也有民族学上的文化含义。从文化角度讲，不同的民族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存在文化差异；从族别角度讲，不同的民族是中华民族这一源流的分支。“一体”强调的是现代意义上中华民族的一体，包含着政治、文化和民族意义的全面含义，其中民族学含义更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如果没有国民意识、公民意识的培养，很难建构出一个具有国家性质的民族概念。要想将我国 56 个民族构建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国家层面的概念，没有国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就不能得到认同。一旦与国家联系起来构建民族，就超越了各个民族本身。“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实际上是说不同层次上的民族认同互不排斥。“多元一体”是我们用来解释经过几千年的“大一统”的理念，升华到在一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中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层面上的民族，即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是在继承传统理论基础上的超越和升华。与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相比，费孝通先生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特点做出的概括性归纳，应该说，在此之前，我们几乎没有中国本土的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社会科学理论创造。源自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建立在由白人构成的主流社会对单一强势文化弊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的理论创造，实际上离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都很远，尽管在价值规范的意义上二者有相通之处。而“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则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特色，是完全以中国本土化的历史和现实为观察对象的研究结论。在理论含义